

翻開瑞典的漢學研究史

113 - 120

羅多弼 (Torbjörn Lodén) 撰

李筱眉 譯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一 ● 瑞典漢學研究的起始

長久以來，中國一直吸引著瑞典的知識份子。第一個到訪中國並將其印象公諸於世的瑞典人當屬Nils Matsson Kiöping，他於1654年隨同荷蘭商人及外交官Frederik Coyet航行至中國沿岸；他的旅遊報告於1667年由Johann Kankel出版，描述中國是一個居住了聰明和快樂人民的國家。到了1694年，Jonas Locnæus在烏普薩拉大學 (Uppsala University) 提出一篇博士論文：*Murus Sinen-sis brevi dissertatione adumbratus*，這是瑞典第一篇以研究中國為主題的論文。三年後，即1697年，羅蘭艾力 (Erik Roland) 在同一所大學也發表了他的博士論文：*De magno Sinarum imperio*。

這些作品乃當時歐洲人對中國漸感興趣的證明，而這些興趣則是由十六世紀晚期一羣首次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所激發的，特別是羅蘭艾力。很顯然地，他讀通了那些研究中國的作品，而這些早期研究中國的著作，一方面反應了當時歐洲認為中國是理想國的概念，另一方面也呈現出介於理想化與批評之間的矛盾。這些批評影響了中國在瑞典人心中的形象，不論是學術界或社會觀念，從早期一直延續到現代。羅蘭艾力認為中國正是柏拉圖所謂的理想國——由哲學家治理的國家。

到了1710年，烏普薩拉大學的東方研究學者塞西斯博士 (Olavus Celsius) 以孔子為論文的主題，論文題目是：*Exercitium academicum Confucium Sinarum Philosophum leviter adumbrans*。這篇博士論文是以卡布列神父 (Couplet) 的著作：*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為基礎；神父的著作影響深遠，其中翻譯了三部儒學經典之作，即論語、大學、中庸。塞西斯發覺這些儒學作品中有Noachian及摩西宗教思想的痕跡，同時也包含了一些理念和基督教信條類似。他和來布尼茲 (Leibniz) 觀點

一致，咸認為中國的宣教團體應該到歐洲來。西元1723年詩人卡爾貝爾曼 (Carl Michael Bellman) 的祖父約翰貝爾曼 (John Arndt Bellman) 出版了法國人包洵 (Jesuit Michael Boutauld) 的著作：*Les conseils de la Sagesse* 的瑞典文翻譯，其中包含了八十則儒家箴言。1758年羅汀 (Jacob Röding) 出版了自己的著作：*Nyare historier om Chineserne*，這是第一本以瑞典文撰寫，而以故事型態詳述中國歷史的書。

西元1731年瑞典的東印度公司成立，該公司的第一艘船於1732年啓航。到1806年為止，至少有130次航行及於哥特堡 (Gothenburg) 和中國的廣東之間。許多自然科學家藉由這些航行到達中國，主要是林耐斯 (Carl Linnæus) 的門生，例如歐思貝 (Pehr Osbeck)，多倫 (Olof Torén)，及艾克柏格 (Carl Gustaf Ekeberg)，而他們後來均著書發表在中國的經驗和印象。1752年歐思貝出版了《1750-1752年東印度之旅日誌》(*Dagbok öfver en Ostindisk Resa åren 1750, 1751, 1752*)，其中記載了許多中國自然與文化的資訊；該書可謂是一部中國植物學 (草藥學) 的百科全書。到了1757年，多倫寫給他的老師林耐斯的七封信被編輯成書出版，其中記錄了他在1750至1752年間航行的經驗。同年，艾克柏格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農業的短篇論文，名為〈中國農業概述〉(*Kort Berättelse om den Chinesiska Landt-Hushållningen*)，他既是林耐斯的好友也是後來文字、歷史與古物研究院院長，1773年又出版了旅遊圖書《東印度之旅》(*Ostindisk Resa*)。事實上許多十八世紀中葉的旅遊記載都很有趣，只是至今無人出版。集小說家與劇作家於一身的史汀柏格 (August Strindberg) 認為這些手稿均應被出版。

以上這些著作是研究早期瑞典人對中國印象的重要資料，也是了解中國如何進入瑞典的第一手資料。前述艾克柏格對中國農業的報導似也肯定了法國物理哲人們的思想，這些物理哲人影響了十八世紀瑞典人對中國的印象。



卡爾雪佛 (Carl Fredrik Scheffer, 1715-86) 是瑞典派駐法國的公使 (1743-1752年)，也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中國文化偏好者，當時他結識了一些物理哲人。後來從1770到1771年，他留在巴黎擔任瑞典王子們的老師，其中有一位王子在1772年繼承了王位，即古斯塔夫三世 (Gustav III)。卡爾雪佛返回瑞典後仍與巴黎的物理哲人們聯絡，特別是米拉伯伯爵 (Mirabeau)、尼摩思伯爵 (Nemours) 以及巴鐸 (Badeau)。

雪佛宣揚物理哲人的理念，以口述傳授他的學生古斯塔夫三世，並完成一系列著作。他認為農業是經濟的基礎，而社會是家庭的延伸，國王位居最上位擔任領導者，擁有絕對的權力，國王的統治應充滿智慧並依循自然法則。居領導地位的物理哲人蓋思耐 (Francois Quesnay) 在他所寫的《中國的專制主義》(Despotisme de la Chine) 一書中指出「合法的個人專制」與「獨裁的個人專制」是不同的；前者是人們渴望的，後者則是被排拒的。物理哲人認為中國已實現了合法的個人專制。

有趣的是，現今1994年再看看上述想法，這些跨文化的印象已經轉變了。今天中國的知識份子發覺「依法治理」的觀念已在中國傳統中消失，反而必須從西方國家引進這樣的概念。

讓我們從物理哲人的觀點來看看古斯塔夫三世於1772年發起的革命。從米拉伯給雪佛的一封信中發覺，他稱頌此革命為「理性革命的第一響」(la première des révolutions qui appartient à la raison)。米拉伯對這位瑞典王非常崇敬，因為他能明瞭「社會理性」(la raison sociale) 和「羣眾理性」(la raison populaire) 之不同。

1772年10月28日雪佛在斯德哥爾摩的科學研究院演講，古斯塔夫三世亦在場，講題為「憲法的性質與人民快樂之關連」(Förbindelsen imellan grundlagarnas art och folkets sällhet)。演說中雪佛稱頌中國可為歐洲國家效法的模範：

難道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一部提倡公共福利的憲法嗎？歐洲人或這些所謂有良好文化的先進國家都應感到慚愧，我們不得不承認，不斷的改變法律和習慣已播下自我毀滅的種子，反觀中國，一套不變的政府系統已幾千年了，那使得他們最強大，人口最多且最富裕，這些我已在前面都談論、說明過了。

然而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歐洲大陸對中國的概念由理想化的極端擺盪至抨擊的另一極端。孟德斯鳩在1748年所撰寫的《法意》(Esprit des lois) 中摒棄了中國帝國是理想國度的觀念；布魯克 (Johann Jacob Brucker) 在他著的

《歷史哲學批評》(Historia Philosophiae Critica) 中譏諷中國哲學 (1742-44)。攻擊的時代來臨了——波符 (Pauw) 在他的《埃及與中國的哲學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égyptiens et les chinois) 中惡意抨擊中國的每一件事情，而這本書在1773年於柏林發行時大受歡迎。

到了十八世紀末瑞典的中國熱褪去，就像時鐘擺盪盪至另一邊一樣。下一章的中國研究史將由1840年代鴉片戰爭後第一批到中國的傳教士開始說起。

1847年漢寶 (Theodor Hamberg) 到香港工作並任貝索教團 (the Basel Mission) 的廣東省代表。漢寶先生學習中文，對中國文化和社會頗了解。在他過世前的那兩年，即從1852年4月至1854年5月，結識了洪仁剛 (Hong Ren'gan)——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的姪兒。漢寶先生對洪仁剛宣揚天主教，而洪則告訴他有關太平天國運動的進展。依據洪氏告訴他的訊息，漢寶先生著作了《中國的反叛領袖洪秀全與廣西叛亂的起源》(The Chinese Rebel Chief Hung-Siu-Tshu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1855年於倫敦出版。漢寶本人指出，著作該書的動機是為了喚醒大家對中國老百姓的同情；依筆者之見，該書對早期的瑞典漢學研究極為重要。

另一位傳教士符艾力 (Erik Folke, 1862-1939) 於1887年至1920年間待在中國。1924年他用瑞典文翻譯了《莊子》(Zhuang Zi) 一書，1927年翻譯了《老子》(Lao Zi)。此外，1922年他出版了一本介紹中國早期思想的書《古中國的哲人》(Tänkare i det gamla kina)。

後來的傳教士中至少有兩位出版了以中國為主題的博士論文，一位是卡哥弟夫人 (Gerty Kallgren)，研究朱熹的思想；另一位是思古納先生 (Gunnar Sjöholm)，研究墨子的哲學。

這些傳教士通常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對一般中國百姓的生活甚感興趣。毫無疑問的，他們是引介中國文化與社會知識給瑞典人的重要人物。儘管如此，許多瑞典傳教士在中國的非學術性活動仍未被記錄。

1870年代史汀伯格 (August Strindberg) 在斯德哥爾摩的皇家圖書館工作，偶然發現了一批中文藏書，這批藏書原為伍莉卡王后 (Lovisa Ulrika, 1720-82) 所收藏。該王后即是我們熟知的普魯士腓特烈大帝的姊妹，也是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母親。這個發現激發了史汀伯格學習中文的興趣，從1877年3月起，他密集的學習了一年的中文，主要目的是為了編目上述中文藏書。同樣在皇家圖書館工作的羅約翰先生 (John Rohnström) 指出，

從史汀伯格一篇傑出的短篇論文中可以證明他的確編目了49種書。雖然我們無法明確的知道史汀伯格的中文能力如何，但無庸置疑的，他的確是全神貫注的學習中文以及有關中國的一切。當時幾位知名的漢學家和他時有往來，包括柯迪爾（Cordier）；他也曾發表許多和中國語言文化有關的論文與短文。

接近十九世紀末，首次出現中國詩集的瑞典文翻譯，即賴森漢（Hans Emil Larsson）所著《中國詩文瑞典韻》（*Kinesiska dikter på svensk värs*），於1894年出版。

二 ● 瑞典漢學研究的成長

不論從了解中國的層面或啟發瑞典人知識方面來看，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末之間出版了許多與中國有關的有趣著作；然而運用科學方法進行漢學研究，則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才開始。

西元1893年，海丁（Sven Hedin, 1865-1952）首次遠征至中亞。他既是地理學家又是探險家，經過了帕米爾、Takla Makan、Tarim Basin、Lop Nor直至西藏北部。第二次的中亞探險是從1899年至1902年，他繼續在Tarim Basin和Lopnor研究，發現被毀滅的城市Loulan。這次探險的學術成果以紀念集《1899-1902中亞之旅的科學成就》（*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共6冊書加2冊地圖）在1905年於斯德哥爾摩出版。從1927至1935年他第三次組織了中亞探險隊，但也是最後一次，成員包括來自瑞典、德國和中國的探險家，這是前所未有最大規模的遠征探險，而探險的成果至今仍陸續出版中。目前已出版了56冊，書名是《海丁博士領導的中國西北省份科學性探險報告，1927-1935》（*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1927-1935*）。

海丁相當成功的集合了各個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對探險所蒐集的資料作科際整合研究。這些與海丁合作的專家中，有幾位特別值得一提，他們是測量學家安布特（Nils Ambolt, 1900-69）、建築學家柏格曼（Folke Bergman, 1902-46）、化石學家保林（Birger Bohlin, 1898-1990）、德國的漢學家康瑞迪（August Conrady, 1864-1925）和漢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德國的人類學家及漢學家來欣（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人類學家蒙特爾（Gösta Montell, 1899-1975），以及地質學家諾林（Erik Norin, 1895-1982）等。

海丁亦是一位多產作家，在學術報告與一般書籍及文

章方面皆然。由於文筆生動活潑，他的一般性作品吸引了廣泛的讀者羣，且喚起瑞典人對亞洲的興趣，包括中國在內，真是功不可沒。

原本海丁在德國拜師於利希侯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門下，因此終其一生傾心於德國，這一點加上個人的政治立場，使他在瑞典備受爭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數十年，有一趨勢是以非學術性理由否定他的學術成就。然而從1970年代後期開始，一股新興興趣代之而起，致力於研究海丁的人生及作品，並出版研究成果。許多年前，有一家電視公司組織了旅行隊走訪海丁中國西部探險所到之處，並製作一系列的節目，吸引了瑞典觀眾。1992年秋天，瑞典海丁基金會和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在Urumqi合辦了關於海丁的研討會。

海丁極可能是第一個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的瑞典人。

西元1875年和1882年，卡爾王十五世（King Karl XV）和別克艾索伯爵（Axel Bielke）分別捐贈了中國藝術品給斯德哥爾摩的國家博物館，形成了日後瑞典博物館中國收藏品的基礎。1907年王儲古斯塔夫阿朵夫（Gustav Adolf），即後來的古斯塔夫六世，開始研究並收藏中國的藝術品；1914年他籌備了史無前例的中國藝術展。展出物品由各國借來，包括瑞典、英國和德國的收藏品，年代從周至清末。1921年王儲成為漢學研究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是一個研究機構，主要從事中國自然史和考古學的研究，同時是促進瑞典漢學研究的中心；1926年成立的遠東古物博物館即由該委員會負責（該館於1929年正式開放給大眾參觀）。

至於斯德哥爾摩的國家博物館，在1926年至1943年間由思瑞教授（Osvald Sirén, 1879-1966）擔任館長。思瑞教授來自芬蘭，原本是研究瑞典與義大利藝術，然而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教授期間（1908-1923），他轉向研究中國藝術，許多研究成果在瑞典的中國藝術入門方面極為重要，如1942至43年完成二冊《三千年的中國藝術》（*Kinas konst under tre årtusenden*）及1949至50年完成二冊《中國庭園及對十八世紀歐洲的意義》（*Kinas trädgårdar och vad de har betytt för 1700-talets Europa*）。

1943年，濟蘭斯瓦（Bo Gyllensvärd）接續思瑞擔任國家博物館遠東部門主任。他希望能將國家博物館和遠東古物博物館的館藏合併，這個理想於1963年遠東古物博物館新館啟用時實現了，新館位於斯德哥爾摩中心的斯蓋修門島（Skeppsholmen island）。從那時起，所有的博物館館藏集中在同一棟樓，由皇家騎衛隊守護著。

濟蘭斯瓦在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之後於 1959 年繼任為遠東古物博物館館長，直到 1981 年退休為止。他寫過許多文章，從不同角度探討中國藝術，但最重要的當屬博士論文：《唐朝的金和銀》(*Tang Gold and Silver*)，於 1957 年發表。接替他任館長一職的是魏京博士 (Jan Wirgin)。魏京博士的專長是研究中國陶器，於 1970 年出版博士論文：《宋朝的陶器設計》(*Sung Ceramic Designs*)。

1914 年地質學家安德森 (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 接受聘任為中國地質探勘隊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顧問。安德森一直在中國待到 1924 年，並參與北平周口店的挖掘，發現了「北京人」。這項中國北方化石發現的榮耀，由他與中國地質探勘隊及烏普薩拉大學共享，正如高本漢所說，這是「至高無上的成就」。這些發現激勵他繼續在中國北方找尋新石器時代的遺跡，終於在 1921 年，在河南省仰韶附近的一個村莊裏發現大量的石頭人工製品及彩繪瓷。事實上，這是首次在中國發現新石器時代遺跡的村莊。

從 1923 年到 1924 年，安德森組織了一支探險隊到中國西邊的甘肅省，在那兒他們檢視了約五十個史前時代的遺跡。探險隊的發現順著黃河帶回北京，又從北京帶去瑞典分析。在中國政府的同意下，這些發現在分析後，有些歸還中國，有些則留在瑞典由遠東古物博物館典藏。安德森為遠東古物博物館的首任館長，直至 1939 年為止，之後才由高本漢接任。他同時也是遠東古物博物館刊 *“the BMFEA: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的首任編輯；該刊於 1929 年首次發行。在這份刊物上，一些重要的瑞典中國研究學者如安德森 (Johan Gunnar Andersson)、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馬悅然 (Göran Malmqvist)、濟蘭斯瓦 (Bo Gyllensvärd) 以及魏京 (Jan Wirgin) 均發表了他們的作品。

安德森被暱稱為「中國的古納」(Kina Gunnar)，是一位非常傑出的作家。除了學術著作之外，他也出版了一些大眾化圖書。因此當我們討論瑞典漢學研究發展時，似乎也應注意到他的兩本書：《黃土地上的兒童》(*Den gula jordens barn* 於 1932 年出版；英文本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於 1934 年出版) 及 1933 年出版的自傳《中國人與企鵝》(*Kineser och pingviner*)。

高本漢 (1889-1978) 是首開中國歷史聲韻學研究之先驅，同時也是促使瑞典中國學變成一學門的建立者。他生長於瑞典南方的 Småland 省，十幾歲時就已對方言研究

產生興趣，並研讀一些當地的方言著作，於 1908 年發表了一篇文章：《維塔郡與摩郡的民間故事，以方言記載》(*Folksägner från Tveta och Mo härader, upptecknade på folkmål; Folk Stories from Tveta and Mo Counties, Recorded in the Local Dialect*)；隔年《瑞典南部與中部方言之界線〔含地圖〕》(*Gränsen mellan syd-och mellansvenska mål (med karta); The Boundary between South and Central Swedish Dialects [with map]*) 問世。1907 年秋天他進入烏普薩拉大學主修俄文，斯拉夫學者藍道教授 (J.A. Lundell) 是他的老師，藍道教授設計了一套繕寫方言的語音表。

由於藍道教授及其他人的貢獻，二十世紀初期比較歷史聲韻學成為一門先進的學問，深深吸引了許多有潛力的年輕人。當高本漢還是大學生時，就決定將他學習歐洲語言及方言的方法應用到研習中文方面。當時瑞典沒有任何一所大學教授中文，於是在 1909 年他取得學士學位後，靠著獲得的一小筆獎學金到俄國聖彼得堡去學基礎中文，自 11 月到 12 月隨伊凡諾夫教授 (A.I. Ivanov) 學習了兩個月；之後又取得另一筆獎學金到中國學習方言。他於 1910 年 3 月前往中國，至 1912 年 1 月才返回歐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他在中國的時間相當短，但由於努力學習，他的中文能力足以去研究、蒐集與二十四種方言語音相關的資料。

他返回歐洲後在倫敦停留了幾個月，隨後到巴黎研讀了兩年 (1912 年 9 月至 1914 年 4 月)，師事夏文奈教授 (Edouard Chavannes)。在巴黎期間，結識了派力特教授 (Paul Pelliot) 和馬茲派若教授 (Henri Maspero)。

1915 年 5 月高本漢在烏普薩拉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論文題目：《中國聲韻學之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其中第一部分是為三千個左右他稱為「中國古字」「注音」；事實上這些字在中國早被編纂成《廣韻集成》，於西元 601 年出版。《廣韻集成》這本字典中每個字的發音都是藉由「反切法」注音的，所謂「反切法」就是用一個字的字首加上另一字的字尾合成某個字的注音。十七世紀的讀者可以懂得這種以兩個字合成注音的方法，然而對現代人而言卻可能視其為兩個不同的字，根本不知是某個字的注音。還好高本漢應用了研究歐洲語言時發展的比較聲韻學原則，同時研究一些中國學者，尤其是清朝文字批評主義 (古文運動) 的專家，然後再將這些字以更精確的方法編製成一套語音類表。在博士論文出版後，他仍繼續中國古字的注音工作，到了 1926 年終於完成《漢語音韻學導論》(*Phonologie chinoise*)。這部著作的中文翻譯版於 1940 年由中國知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李方

桂和羅長培合力完成。

1918年9月，高本漢被聘為哥特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東亞語言學與文化學系教授，主要教授中文和日文。他的學生有瑞典人及其他國家的學人。於1922年他再次造訪中國，但卻是最後一次；1931年到1936年他擔任該校校長，1939年他離開哥特堡搬往斯德哥爾摩，接任遠東古物博物館館長及東亞考古學教授。

整理完成中國古字的語音之後，高本漢開始著手整理他所謂的「遠古文化」（Archaic Chinese），也就是紀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語言文字。這一次他主要是依據《詩經》（*Shijing*）中的音韻。

這些中國古字與遠古中文注音的結果於1940年首次出版，叫“*Grammata Serica*”；1957年修正再版，改名為“*Grammata Serica Recensa*”。1954年他出版了《古代與遠古中文語言學概述》（*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記述了該項重整工作所運用的資料內容、方法及結果。

毫無疑問的，這些中國古文聲韻的整理可說是高本漢最主要的學術貢獻，事實上他在其他方面也有非常傑出的成就。譬如對詩經的翻譯及注解——‘*The Book of Odes*’及‘*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自1942—46年刊載於《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對書經的翻譯及注解——‘*The Book of Documents*’及‘*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自1948—49年刊載於上述刊物），至今仍被視為經典之作。其他語言學方面成就的例子很多，如註釋《左傳》（*Zuozhuan*）（1969—70年刊載於《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漢以前的籀文字 I—V》（1963—67年《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古典中文字庫選集 I—III》（1972—74年《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以及最後的兩本著作：《老子今釋》（《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47, 1975，事實上這是一部《老子》的翻譯作品）和《莊子章句選論》（《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48, 1976）。

古代中國宗教研究方面，他的論文《古中國的傳說與信仰》（《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8, 1946）及《中國周朝的獻祭》（《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40, 1968）咸被認為是極重要的貢獻。從1930年代開始到1960年代後期，高本漢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國早期銅器的重要論文，如《早期中國銅鏡上的銘刻》（1934年）、《中國銅器的起源》（1937年）、《早期銅器飾品文字文法的註解》（1951年）、《殷商時期的武器與工具》（《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17, 1945）、《遠東古物博物館的新收藏銅器》（《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24, 1952），以及《早期中國的銅鏡》（《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40, 1968）。

高本漢以瑞典文出版的許多著作，除了有研究中國歷史的之外，也有研究中國語言的。如：1918年的《中土王國的字與筆》（*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1929年的《中國的思想世界》（*Från Kinas tankevärld*）、1920年的《19世紀的東亞》（*Östasien under nittonde århundradet*），及1964年的《中國的宗教：經典的古董》（*Religion i Kina: Antiken*）。

此外，在1940年代亦出版小說，如《來自烏普薩拉的兩位紳士》（*Två herrar från Uppsala*），1942年；《跳舞吧，我的娃娃》（*Dansa, min docka*），1943年；《卡那帕的婚禮》（*The Wedding in Karnap*），1945年。

大約在高本漢過世前一年，我和尼德罕教授（Joseph Needham）一起由劍橋出發到斯德哥爾摩外郊的醫院探望他，當時他的身體已很虛弱，但卻因此而突顯了他不平凡的意志力和精神。我個人並不認識他，對他的了解完全基於他的著作及別人的傳聞：明確、敏銳、有目標、直言無諱。他著作風格的特點是簡明而無虛字，但在這簡潔的文筆下卻又蘊涵情感。關於此點，我們可從他為漢朝學者劉歆辯護，反對宣稱先秦文字的古文本都是偽造的說法略窺一二。他這種毫不保留的辯護正是堅持真理的表現，同時反應了他愛好事實而反對臆測。我個人認為這樣的精神和清朝那些文字批評主義的專家類似，如嚴若璩（Yan Ruoku）、錢大昕（Qian Daxin）、戴震（Dai Zhen）、段玉裁（Duan Yucai）、王念孫（Wang Niansun）等人。他和這些學者一樣，認為學術工作就是要證明事實，而不是臆測。

當高本漢在1939年搬到斯德哥爾摩時，並未打算從事教學工作，但是1945年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提供他一筆基金，訓練一批斯堪第那維亞的漢學研究者；該基金會也提供了另一筆經費擴展遠東古物博物館的圖書館。因此，自1945年到1965年，他在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了二十年的漢學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的學生有安德森（Olov Bertil Andersson）、比倫斯泰因（Hans Bielenstein）、布羅曼（Sven Broman）、埃格羅茲（Søren Egerod）、何亨利（Henry Henne）及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他們大都在斯德哥爾摩受了兩年訓練之後，被送到中國繼續學習並蒐集研究的資料。其中埃格羅茲、何亨利及馬悅然後來分別成為哥本哈根、奧斯陸及斯德哥爾摩的漢學教授，因為他們擁有決策的權力，主導了三個斯堪第那維亞國家的漢學研究發展。至於比倫斯泰因後來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教授；安德森則成為中文講師，在烏普薩拉大學完成他的事業；布羅曼成為斯德哥爾摩人種學博物館館長。

在高本漢的學生中還有濟蘭斯瓦，於1959年接替高本漢繼任遠東古物博物館館長；魏京在濟蘭斯瓦之後接任《遠東古物博物館館刊》編輯，目前為該博物館館長。其他的學生如邱松寶（Seung-bog Cho）是斯德哥爾摩大學日文教授；石坦禮（Sten Stenqvist）目前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的中文講師；葛艾思（Else Glahn）曾任阿休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的中文講師；高葛蘭（Gerty Kallgren）在1958年取得漢學博士學位，但後來離開了這個領域；哈特湯姆斯（Thomas G Hart）目前是瑞典中國政治方面的主要教授；柯威力（Willy Kyrklund）成為作家；來汀（Olof Lidin）現在是哥本哈根大學的日文教授；林西婭（Cecilia Lindqvist）個人擁有中文方面專長，目前在中學教中文；林思凡（Sven Lindqvist）則是作家和評論家。

這些學生當中，只有三個人向高本漢提出漢學方面的博士論文，分別是比倫斯泰因、布羅曼和高葛蘭。其他人則於其他學門或學校取得學位；還有些人是後來提出職業水準的論文才獲延攬成為世界各地知名大學的漢學教授。

三 ● 現代時期

1965年馬悅然放棄了在澳洲坎培拉的中文教授一職，自澳洲返回瑞典，擔任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漢學教授，特別是現代中國語文方面。

馬悅然曾是高本漢的學生，因此早期受過完整的古典中國語文訓練及聲韻分析。1948年到1950年他待在中國，蒐集有關四川方言的資料，後來完成文章〈兩種四川方言註解〉（*A Note on two Szech'uanese Dialects*）及論文〈四川話的造句法〉（*The Syntax of Bound Forms in Sich'uanese*）和〈西方的中國聲韻學研究〉（*Studies in Western Mandarin Phonology*）。馬悅然延續了高本漢的傳統，著手研究《公羊傳》（*Gongyang*）和《穀梁傳》（*Guliang*）的文字，這些研究結果以《公羊和穀梁評論的研究 I—III》於1970年代出版，可視為董仲舒《春秋繁露》（*Chunqiu fanlu*）文字解析的緒論。儘管馬悅然尚未出版他對《春秋繁露》所作的研究，但基於對語言文字的分析，他認為該著作中絕大部分不可能於魏晉南北朝之前完成。

馬悅然出版了許多英文著作研究中文文法和中國古典詩集，此外，也有許多瑞典文著作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學。在語言學方面，近年來他的主要興趣是研究古代漢語表達情感的方式。

儘管馬悅然一開始延續高本漢的研究傳統，被視為古

典中國學家，但後來卻逐漸投入介紹和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瑞典文和英文均有。他的第一部翻譯作品早在1948年出版，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Taohuayuan ji*）；但是第二部翻譯作品卻在十年後1958年才出現，是老舍的短篇小說；第三部是1965年出版的《唐宋詩詞選》。自1970年到1984年間，共出版了33種翻譯作品，其中包括許多本書，如1976到79年翻譯整套《水滸傳》（*Shuibu zhuàn*）、一冊《毛澤東詩詞全集》以及四種二十世紀中國詩與散文的選集。

自1984年開始，馬悅然的作品如泉湧現，如1987年翻譯沈從文的《邊城》（*Biancheng*），一年後又有同一作者的作品集問世，但主要著重於翻譯毛澤東前期的中國文學。從1983年開始，他翻譯了好幾位文化大革命後年輕現代詩人的作品，例如北島（Bei Dao）所有著名的詩。毫無疑問的，這些引起西方人注意的現代詩人，在中國文學領域內的確佔有重要的地位；再者，馬悅然是引介這些作家來吸引西方讀者和評論家注意的西方學者之一。

在馬悅然的近作中，我最後想提出的，是他翻譯高行健（Gao Xingjian）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說《林山》（*Lingshan*），以及李瑞的短篇故事，甚至最近完成了《西遊記》（*Xiyou ji*）的翻譯。

1985年，馬悅然獲選為瑞典文學院諾貝爾文學獎評議委員會委員，這是中國文學領域首次在該院佔有一席之地。

由於翻譯當代中國文學，馬悅然結識了這些中國作家；有趣的是，這樣的接觸也使中國的作家熟悉瑞典文學。例如詩人北島在一些人協助下，包括馬悅然和北京的瑞典文學專家李之義先生（Li Zhiyi），出版了一冊北歐現代詩選集。結果我們發現，從當代的中國詩中可以尋獲北歐詩人的影響，如蘇德廣（Edith Södergran）、亞覺克維思（Pär Lagerkvist）及川斯琢磨（Tomas Tranströmer）。馬悅然的重要在於他不僅是瑞典主要的漢學家，也是促使中國與瑞典文化交流的中介；在最後的二十年裏，他扮演了瑞典與中國文化接觸的催化媒。

馬悅然有很多學生，他在斯德哥爾摩擔任漢學教授的二十五年中，有十三位學生獲得該校博士學位，另外至少有三名學生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直到他退休，有幾位學生仍繼續他們的博士論文，其中蓋瑪雅（Maija Kaikkonen）和羅德（Bertil Lundahl）兩位已經完成；第三位學生索瑪多先生（Göran Sommardal）目前在瑞典廣播公司任文學評論家，出版了一部重要的瑞典文學著作，討論早期至1920年代的中國文學。馬悅然的這些學生論文題目涵括甚廣：古典語言學、現代史與政治、現代文學與

文學理論等，這樣廣泛的題材反應了瑞典漢學研究領域的擴大，以及研究現代中國文化和社會的傾向。

這項瑞典中國研究的新趨勢和1960年代的左翼運動有關；這項運動集中注意力於第三世界，特別是中印戰爭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我本身於1968年開始學習中文，當時左翼運動正達高峯。

由於反越戰及檢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瑞典的年輕知識份子和西方知識份子一樣，開始嚴厲地檢討西方民主的意識型態。以越南為例，美國政府宣稱是為自由和民主而戰，但事實上卻是支持一個腐敗而高壓的王國。從檢討西方意識型態的觀點來說，由第三世界人民那兒了解他們的國家是很重要的，中國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只有自己的人民才能了解自己的國家。由於這樣的心理狀態，使我們針對同樣的議題，對來自中國和西方國家的說詞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只要是來自中國的聲明，不論是官方或半官方，我們大多會寬容的接納；反觀來自西方國家的聲明則不然。易言之，我們很大膽地吸收了許多文化大革命的宣傳。

綜上論述我們深加省思，毫無疑問的，自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初期，由左翼觀點出發所撰寫關於中國的瑞典書籍和文章均嚴重的被理想主義所侵蝕，缺乏聆聽難民的心聲以及某些學者的意見；這些學者就像安徒生童話故事《國王的新衣》中的裁縫師，他們試圖讓國王（王國）赤裸地呈現在我們眼前。儘管如此，左翼運動仍有它正面的意義存在，至少它激勵了年輕學生和學者研究當代的中國文化和社會。一些作家如米道爾（Jan Myrdal）和林思凡（Sven Lindqvist），也成功地引導了年輕學人研究中國文化與社會的興趣。

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期間，除了馬悅然的學生之外，也有其他人發表研究中國的博士論文與學術著作。如政治學家湯瑪斯赫特（Thomas G. Hart）研究中國的革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教育學家羅福斯特（Jan-Ingvar Löfstedt）研究中國的教育；藝術史學家柏格倫（Lars Berglund）研究古代中國藝術與建築；林西婭（Cecilia Lindqvist）教授出版了廣獲好評的《研究中國文字的起源》。

四 ● 前瞻之路

西元1984年，亞太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acific Asia Studies [CPAS]）成立了，主要是為瑞典學術界研究亞太政經社會與文化發展提供動力。就組織上來看，該

中心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的一部分，由校長直轄管理的綜合學科中心；但實際上它卻與整個瑞典學術界息息相關。

1986年，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皇家圖書館和遠東古物博物館的所有中文藏書集中典藏於遠東圖書館中，該館附屬於斯德哥爾摩的遠東古物博物館。

1993年，亞太研究中心和東方語文研究中心（負責阿拉伯文、中文、印度文、日文及韓文研究的大學及研究所訓練課程）搬到屬於他們自己的「亞洲之屋」（Asia House），座落於斯德哥爾摩市中心北方的布汶斯維肯灣（Brunnsviken bay）海岸邊的Kraftriket。是年6月，兩中心合辦「當代中國思想的國家、社會與個人觀國際研討會」。依個人之見，將來亞太研究中心、東方語文研究中心和遠東圖書館很可能加強合作，合力建立斯德哥爾摩亞洲研究中心（Stockholm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作為亞洲研究的主力站。

目前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東方語文研究中心的中文研究雖然著重於知識份子的歷史、當代文學及通俗文化，但博士候選人的研究主題卻相當廣泛，從詩經、晉以前的哲學思想、李清照的詩到苗語書寫方式、現代中國的宣傳與毛澤東後社會價值的轉變等。該中心中文系的學術職員相當少，包括一位系主任研究「中國語文與文化」（目前由我擔任）、一位講師石坦禮先生（Mr. Sten Stenqvist）、一位研究人員蓋瑪雅博士，專攻當代中國通俗文化研究，及一位外國講師Mrs. Ningsu Malmqvist。

此外，陳邁平先生（Chen Maiping）擔任訪問學者及教師，同時也是博士候選人，在他待此的最後兩年內，做了很多事，其中一件是編輯《今日文學雜誌》（*Today Literary Magazine*）。1992-3學年，著名的中文學者劉再復教授（Liu Zaifu）擔任現代中國文學的訪問教授；後來陸續有一些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

至於亞太研究中心，著重於當代中國政治的研究，特別是湯瑪斯赫特教授（Thomas G. Hart）研究中國的政治，包括內政和外交。副教授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是中國政治課題與宣傳方面的專家，目前致力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他也是《中國哲學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的編輯，這是一本翻譯作品的季刊，由紐約申普公司（M. E. Sharpe Inc., Armonk）發行。王業藩博士（Wang Yeu-farn）著述探討中國引進科技的問題，目前研究中國企業家在東南亞所扮演的角色。其他還有來自各國的學者，停留時間長短不一。

自1989年開始，倫德大學（University of Lund）也有中文教授職位。羅格瓦教授（Lars Ragvald）是接受該職位的第一人，他的國語和廣東話均很流利，同時很了解

中國文化和社會。該校的東亞語文系由林達博士 (Kristina Lindell) 創立，她本人是一位語言學家，精通中文和好幾種東南亞語文。該系目前開設了大學部和研究所的中文研究課程，羅格瓦教授現正領導編纂第一部大規模的漢瑞字典。其他該校教職員中值得一提的，還有格翠思博士 (Roger Greatrex)，專精於現代之前的中國科學史；羅德博士 (Bertil Lundahl)，主要興趣與古文運動有關，研究辨識中國古文的真偽。該大學博士候選人的研究主題亦多元化，從君主專制和人權到南京方言和中國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對知識份子的控制等。

在古特堡，東方語文系於大學部開設中文課程，由安瑪斯先生 (Mats Engberg) 擔任主要教師，他曾在古特堡和中國學習中文。而當代中國社會的研究則由東亞暨東南亞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主導，該中心主任是阿斯坦教授 (Claes G. Alvstam)。在烏普薩拉大學亦開設了為期一年的中文課程。

假如我們比較瑞典漢學研究的兩位頂尖人物：高本漢和馬悅然，我們會發現瑞典在漢學研究上的轉變，由尋找知識上的解惑轉變成文化融合的代理人。事實上，我們從馬悅然身上即可發現這樣的轉變，約在1970年以前，馬悅然主要遵循著高本漢的古典漢學研究路線；自1970年後他開始新的漢學研究方向，具有文化融合的特質。為了理解這樣的轉變，我認為必須由他個人的特質、個性及精神層面去考量。

馬悅然敏銳的分析和審美觀使他非常適任文化交流中介者的角色。由於現代科技發達，世界距離似乎縮小了，因此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人才。就長期來看，文化融合會促使一種多元化世界文化出現，而且唯有對多種文化深具了解的學者才能維護高層次文化融合的進行，並引領其上軌道。我誠願當代的漢學家和我們的學生能運用對中國文化與社會的了解去促進文化融合，這才是未來幾十年漢學家最有意義的工作！

編者按：本文譯自 *Outstretched Leaves on his Bamboo Staff: Studies in Honour of Göran Malmqvist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by Joakim Enwall (Stockholm: The Associ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1994) 乙書中，由 Torbjörn Lodén (羅多弼) 所撰之“Towards a History of Swedish China Studies”(pp.5-25) 乙文。囿於篇幅所限，原文所附之46個註釋並未隨文譯出，謹在此致歉。本譯稿完成後，蒙著者寓目並指正。

Outstretched Leaves on his Bamboo Staff

Studies in Honour of Göran Malmqvist
on his 70th Birthday

Edited by Joakim Enwall

The Associ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Stockholm